



重视文艺作品的历史真实性

王春瑜

我国历史悠久,文化积淀丰厚,如深山巨矿,开采不完。新时期以来,取材于我国古代、近现代历史的文艺作品,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的一些优秀作品之成功秘诀则在于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完美统一。而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首先要尊重历史。

历史的真实性,主要体现在:一、文艺作品描写的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总体上必须符合那个人物及所处时代的本来面目,如不能把秦始皇简单地写成暴君,也不能对他的“焚书坑儒”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不能看到南宋的经济、文化有一定的成就,就歌颂偏安一隅、不思恢复中原、悍然杀害抗金民族英雄岳飞的宋高宗,甚至为汉奸秦桧翻案,等等。优秀影视作品《长征》、《血战台儿庄》、《新四军》、《周恩来在上海》、《重庆谈判》、《武则天》等,都显示了历史真实性与艺术真实性的统一。

二、重视历史细节的真实性。历史不断变迁,每个历史时期的文化、社会生活,都会有种种差别,从而构成那个历史时期的特征。如喝酒,元朝以前国人喝的都是黄酒、米酒(酒酿),元朝从阿拉伯传来烧酒,但直到清朝中叶后,才风行天下,因此武松喝的十八碗酒,不可能是烧酒;若然,他肯定醉死、烧死了。又如打麻将,虽然清初出现雏形,但真正的麻将,要到道光以后,才流行开来,成了无数人沉湎其中的“国粹”。文艺作品中,如果宋朝人、明朝人就打麻将打得热火朝天,那就是大笑话。以《武则天》为例,陈加林导演特地邀请唐史专家担任历史顾问,并一直跟随摄制组,随时指出拍摄中有违唐朝历史真实问题。

三、忠实地反映历史上人民的愿望。历代统治者仰仗皇权,作威作福,欺压平民。百姓敢怒不敢言,总希望有人通过作品,替他们出一口恶气。秦腔、京剧、淮剧、河北梆子等戏曲演出的《打金枝》,就是百姓愿望的体现。“敢在太岁头上动土”,演出《打龙袍》,也就是象征性地打了皇帝,与民谚“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反皇权精神,是息息相关的。周公“制礼作乐”,儒生炮制了一本《周礼》,用的周公名义束缚人民,宋明理学更是用理学杀人,使人不透不过气来,妇女尤甚。百姓把账算在周公身上,无情地撕下他的假面具。我读中学时,看淮剧《桃花女斗法》,被美丽的桃花女勇斗周公,不屈不挠,死而复生,使周公遭到严惩而深深感动。这个戏至今还在一些舞台

演出,包括台湾的歌仔戏,表明了其生命力的永久。如诸诺史实,这些戏的本事,当然是子虚乌有。但是,人民却爱看这些戏,因为它承载着人民的精神寄托。史籍上,特别是民间文学有关这类题材的记载并不少见,有待文艺家们去发掘、提炼,写出人民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

四、历史真实性更多地表现在,历史上虽没有这件事,但按照当时的历史条件、氛围,是完全可能发生这样的事的。优秀电视剧《长征》,博古在沼泽里摸鱼,把眼镜都弄丢了,状甚狼狈,但他关心重病战友,想摸鱼熬汤增加其营养的同志之爱,打动了观众的心。红军长征,历经艰难,翻完最后一道雪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全体同志,笑逐颜开地集体滑雪下山,虽于史无据,却同样显示了历史真实性,增加了艺术感染力。

我们必须看到,当前的文艺作品,尤其是一些历史题材影视剧,存在严重违反历史真实性的倾向。在一些作品中,不与发动叛乱的血藩同流合污的大丈夫唐寅,成了武艺超群,动辄打斗的流氓;雍正皇帝成了手执利器、飞檐走壁的侠客。这是对历史人物的严重歪曲。戏说乾隆、戏说纪晓岚之类作品难以让人接受。在此类作品中,刻苦治学、为修“四库全书”而卖掉老家献县田产的纪晓岚的高尚人格不见了;他在灯下孜孜不倦写《阅微草堂笔记》的辛劳、愉快也不见了;他主持修“四库全书”时的助紂为虐,大搞文字狱、删书、烧书的丑恶一面更不见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纪晓岚,成了嘻嘻哈哈、油腔滑调的老油子。而乾隆皇帝,则成了多情多事,简直是成天吃饱了撑的老痞子。这对历史上真实的乾隆爷、纪文达公来说,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这类作品与《还珠格格》不能相提并论,还珠格格完全是虚构的人物,当然可以戏说。

那些打着历史小说或正剧的幌子,实际上在胡编的作品,其危害性尤其不能低估。拍项羽火烧阿房宫、荆柯刺秦王的电视剧的是大牌导演,但秦秦英雄项羽,被拍成了残暴至极之人;荆柯是位抗秦、勇刺秦王的侠士,被拍成敬畏秦始皇、临阵退却的懦夫。电视剧《康熙王朝》、《雍正王朝》,完全背离了当时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抹煞了历史真实。虽然“清承明制”,清朝继承了明王朝雄厚的家底,并消除了明朝

末年加剧社会矛盾的种种严重积弊,促进了社会发展。但是,人民的反抗从未停止,小规模起义不断。康、雍、乾时期规模空前的文字狱,窒息了知识分子的思想,他们被迫把精力耗费在考证草木虫鱼的死学问上。而同一时期的西方世界,已开始工业革命,乾隆五十年(1785年),英国建成了第一个蒸汽机制造厂,轮船已经航行在茫茫大海中。而康、雍、乾三朝,继续奉行闭关锁国的国策,以老子天下第一的天朝自居,妄自尊大,全面落后于西方,脱离世界潮流。清代御用文人,居然说什么康雍乾盛世,显然是患了政治色盲症的结果。而相关影视作品,把上述余唾奉为至宝,制造幻影,粉饰所谓盛世,闻不到一丝文字狱的血腥气。而虽然勤政,但用极卑劣手段剪除政敌、兄弟,为人阴险残暴的雍正皇帝,成了为国为民鞠躬尽瘁、至情至性的一代明君,真不知悖到哪儿去了!必须指出,违背历史真实的文艺作品,以清官戏最为严重。十多年前,我曾问清史、故宫专家单士元看不看清官历史的电视剧,他正色道:“从来不看。太胡编乱造了!”

一些文艺作品中违背历史细节的真实性,更已闹到匪夷所思、荒唐可笑的地步。一部写司马迁的长篇历史小说,居然写司马迁看到了汉武帝与妃子调情;《史记》是藏之名山,司马迁死后很久才问世的,这部小说,却写司马迁还健在,有人已读了他的书;还写是汉武帝亲手把司马迁杀死的,全是瞎编。一部写郑成功的长篇历史小说,写郑成功大军是用尿屎连结在一起,渡过台湾海峡,打败荷兰殖民者的,真让人笑掉大牙!《康熙王朝》里的人物,包括孝庄太皇太后,动辄自称“满清”,实际上,“满清”一词是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反清时使用的,是贬义词,包含敌意,清朝统治者怎会自称“满清”。“孝庄”是孝庄文皇后简称,可是在《康熙王朝》里,孝庄皇后竟然说“我孝庄”如何如何,太没历史常识了。

涉及到历史的文艺作品,要葆有历史真实。应当对历史下一番功夫。如果不认真对待历史,尊重历史的严肃性,哪有真实可言?如不懂历史,何不虚心请教历史学家?实际上,以明清而论,仅从朱元璋到乾隆皇帝,野史、笔记记载的,他们的非常戏剧化的生动故事,敢说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如搬上银幕,绝对好看。对史实的冷漠与无知,必然使文艺作品的历史真实性越来越离谱,误导观众,特别是贻误青少年。重视文艺作品的历史真实性,杜绝胡编戏说,是及时矣!

随着文化建设的大发展以及对外交流的深入发展,我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但较之西方发达国家而言,我国的文化国际影响力,无论是在价值观念层面还是文化产业方面,仍存在不少差距。如何克服困难,抓住机遇,让中华文化走向国门,绝不是一时一事的权宜之计,而是关系到我国文化在世界文化

中如何定位的百年大计,应当从国家发展战略高度来谋划。

提高我国文化国际影响力,首先要统筹安排,统一规划。文化发展须有一个全局性的规划,改变目前各行其是、各自为战的格局。要组织有关专家学者深入调研,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统筹国内情况和国际环境、长远目标和近期效果,系统全面地制定对外文化发展规划。政府负责制定大政方针,在政策导向、制定规则、人才培养、税收、产权保护等方面多做工作,积极发挥传播媒体、文化团体、学术界、文化企业、民间组织的作用,让政府与社会力量形成良好的互动机制。

二要对中国文化进行认真总结和梳理。中国文化的特点是开放多样,讲究多元一体、和而不同,有必要对此进行认真梳理和总结。在发掘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同时,发掘现代中国文化中有价值的内容,寻找中国文化中那些不变的文化“遗传基因”。对外传播时,也不能仅在形式上下功夫,限于杂技表演、书法国画展览、踩高跷、太极拳以及孔子学院推广汉语语言文字等等。这些活动在推广中华文化方面的确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远远不够。我们需要在更高的价值层面提出自己的东西,比如“和为贵”儒家思想以及在此基础上提出的“和谐世界”的外交思想,它既不同于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等西方价值观,又能让别人刮目相看甚至肃然起敬。在中国文化走出去之前,首先要对什么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有准确的认知和判断。因为文化自信要建立真正的民族文化精华基础之上,这样才有文化凝聚力,才谈得上树立形象。

三要加强民族文化多样性宣传。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之间虽有矛盾冲突,但主流是团结统一。和而不同的理念很大程度就是来自于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实践。历史上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友好交往、

和平共处的经验,是一份宝贵的遗产。中国的国际形象包含有多样和谐统一的理念,弘扬中华民族睦邻友好的传统,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澳大利亚是个移民国家,其旅游、外交则用了

了很多原住民文化符号。我国西南族群长期以来和谐相处,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神话传说,关于族群的分布等都有一套很好的解释。

和谐睦邻的观念,就是从最古老的神话传说里来的。我们把历史上很长时间比较和谐的多元族群文化、族群关系这样一些要素纳入文化建设的大课题中,展现给世界。

四要创新文化宣传的方式和方法。提高文化软实力,对内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对外传播要考虑别人的感受。比如我们经常在各种国际场合讲中华文化历史悠久,是世界上唯一“不断裂”的文明,这种表述让听者有些逆耳。有些话由外国人讲,比我们自己说出来效果更好。美国在世界各国推出很多出版物,它不说自己光荣传统,而是请外国人来写当代美国社会。外国人近距离看美国,对美国社会既有抱怨也有肯定,但宣传效果很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应该多讲中国人的日常生活,要让外国人知道当代中国文化,了解中国人日常生活形态。这类出版物不仅要给外国人看,我们的出国人员也应当人手一册,了解自己,才能更好地交流。

五要发挥专家学者的作用,设法影响国外精英。在对外学术交流

和交往方面,专家学者可以做很多有益的工作。比如,我们的驻外文化官员,应该是一批既懂中国也懂外国,特别是对所驻国家有所了解、有过研究的人。让专家学者来做这种工作,比起职业外交官更能见到成效。不管是西方的东方的,思想家还是艺术家,真正能影响大众的是精英的观点。如果绕开精英,我们拿出的东西都是大众化的甚至快餐型的,就不能在一个量级上竞争。要精心选择“内知中国、外知世界”的人,拿出有说服力的文化项目,瞄准国外最有影响的人做工作。这样,也许短则三五年,长则三五十

年,就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民族飞天梦的激情书写

——评长篇报告文学《千古一梦》

王 晖



有了抬头望天的习惯,发射场成了我的精神牧场,飞船则成了我心中一个遥远的梦!”这个以青年记忆为主的“飞天梦”其实就是作者后来专注于航天题材写作的原动力,也是他进行文学创造的不竭之源。

从叙事的角度上讲,《千古一梦》应该是能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应和读者的阅读期待的。不论是那些曾经作为绝密的重要事件、决策经过,甚至矛盾斗争,还是深陷其中的从国家最高决策层到基层群众等各色人物,都会给人以悬念感、神秘感和新鲜感。某种意义上而言,这其实正是当下类似电视剧《暗算》、《潜伏》之类的解密文艺,不过,后者为虚构影像,而前者则为非虚构的真实故事。李鸣生敏锐地抓住了这个契机,将这样一个惊心动魄、千回百转的历史事件艺术地呈现出来。值得肯定的是,李鸣生并没有因为这样一个极具可读性和解密性的历史存在而极尽噱头,甚至搬弄虚构与夸张,而是恪守报告文学非虚构性的基本规范,力求在艺术的表达中完整地呈现历史和现实,不避争议、矛盾和失败,还原人物的真实心态,最大限度地再现历史的原生态,使文本在史诗性叙事中获得了可贵的文献价值。《千古一梦》的叙述时间基本为传统的连贯叙述,也就是按照中国载人航天从提出设想到成为现实的时间顺序,即从1958年8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中国第一个卫星小组,开始载人航天的科学探索,到2003年10月15日中国第一个载人飞船神舟五号成功发射升空。全书以“曙光”飞船、“七论战争”、“卧薪尝胆”、“血火涅槃”、“飞越人间”等五大部分内容相联结,环环相扣、有条不紊、首尾呼应、一气呵成,显示出作者把握复杂题材的叙事能力。为了克服平铺直叙的冗长感,增强叙事的生动性,作家又在连贯的叙述中使用

了闪回等手法,如第五部分“飞越人间”里写神舟五号飞船的研制和“飞天”过程,当叙述到杨利伟等3名航天员在离飞船发射还剩14个多小时开始起飞前的最后睡眠时,作者荡开一层,用“为了这一”一章的篇幅写了指挥长李继刚和张建启、总设计师王永志和任新民、专家戚发轫和范峰等几位重要人物,在这个难眠之夜追憶围绕飞船制造所经历的种种往事。“过去”与“现在”的交错出现,就使得文本波澜起伏,节奏鲜明,富有阅读的快乐。此外,作品的叙事性话语和非叙事性话语的个性化也是十分显明,而作者作为川人的细腻感在书中也随处可见,譬如对中美两国在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的航天科技合作,作者写道:“一个需要造飞船的技术,一个需要填肚子的面包,于是,两个分离了几十年的‘兄弟’又跨过欧亚大陆,握手言和,坐在了同一张餐桌和同一张会议桌前,一个握筷子,一个拿叉子,一个说汉语,一个讲俄语,开始了新一轮的沟通与交流。”这样的文字,为沉重的宏大叙事增添了某种难得的轻快和愉悦,也从一个层面让人领略了作家的独特个性。

在当代的报告文学作家当中,李鸣生是有个性的一位。这不仅是指他的个人魅力,更是指他的写作理念。最近,他在《中国作家》杂志发表的他

李鸣生有着浓烈的“航天”情结,已出版的“航天六部曲”(即《飞向太空港》、《澳星风险发射》、《走出地球村》、《风雨“长征号”》、《远征赤道上空》和《千古一梦》)无疑是最能代表其成就、凸显其形象的重磅作品。作者对于航天题材的偏爱和专一,恐怕是当代报告文学作家中的唯一。李鸣生有着自己的题材根据地,这就是有关中国航天事业的历史与现实。可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作家关注的题材和书写领域,更是作家的青春情结之所在。在作品中,作者写到他30年前当兵走进西昌发射场,就开始怀揣了一个飞船上天的青春之梦:“从此,我便

《千古一梦》研讨会举行

中国作协创研部、江西出版集团日前在北京现代图书馆隆重举行了《千古一梦》作品研讨会。与会者认为,长篇报告文学《千古一梦》以其大气磅礴又饶有兴味的叙述,将深沉的历史感、理性的科学精神与热烈的诗情融为一体,成功地铸造了一部展现中国载人航天壮伟历程的民族史诗,展示了太空之旅的揭秘之作,民族精神的弘扬之作,政治社会的思考之作。《千古一梦》叙写重大题材,传扬科学精神,显示出强大的精神力量。作品在展现中国载人航天的艰难历史进程、讴歌伟大的载人航天精神的同时,还寄寓了作者理性的历史反思,以及对于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其深厚的意蕴启人深思,表现出可贵的史诗品格。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杰出贡献的飞船总设计师戚发轫作为特邀嘉宾出席。中央军委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李继耐上将将为研讨会发来贺信。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成员、副主席陈建功在会上致辞。(江亦文)

袁牧之诞辰 100 周年纪念会在京举行

今年5月30日,是我国著名电影艺术家、电影事业家、人民电影和新中国电影开拓者袁牧之诞生100周年纪念

早在20世纪30年代,袁牧之就在话剧舞台上成功地饰演了不同类型的角色,赢得了“舞台千面人”的美誉。1934年袁牧之加入到我党直接领导下的电通影片公司,先后主演了《桃

李劫》、《风云儿女》和《生死同心》等三部影片。在《风云儿女》影片中他成为“第一位在银幕上唱《义勇军进行曲》的人”。1937年,编导了堪称中国电影经典之作的《马路天使》。他奔赴延安,组建了人民电影的第一个制片机构延安电影团,并编导了大型纪录片《延安与八路军》。抗日战争胜利后,袁牧之受命参加接收伪“满映”,并担任东北电影制片厂厂长,成为新中国第一任电影局局长,为新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文一)

让科学精神在文学中传扬

赖大仁

长篇报告文学《千古一梦——中国人第一次离开地球的故事》,以文学的方式书写重大的科学创举,讴歌我国载人航天的伟大科学精神,让科学精神在文学中传扬,成为一部富有史诗品格、大气磅礴震撼人心的作品。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无疑是举世瞩目、彪炳史册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本身就具有非凡的意义。这部作品以此为题材,以报告文学特有的文体优势,形象生动地再现了这一重大事件,真实地记载了这一历史进程,以文学的方式记录写史,其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意义不言而喻。同时,作者并不仅限于书写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本身,而是更追求通过叙事写人开掘主题,表达思想意蕴。就这部作品而言,其立意既在于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立传,更在于为中国人的“载人航天精神”树碑。这种“载人航天精神”,就是一种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的精神,是一种自尊、自信、自立、自强的国民精神,而这正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具体体现。作品中,这种“载人航天精神”并不是空洞抽象的,它体现在一个个人物的具体行动中,体现在一个个生动的故事和细节中,而这正是作为报告文学作品的感人之处。不仅如此,作品在展现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艰难历史进程,讴歌伟大的载人航天精神的同时,还寄寓了作者理性的历史反思,以及对于民族命运的深刻思考,其深厚的意蕴启人深思,显示出感人至深的精神力量。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部报告文学就是一部形象化的中国载人航天史,表现出质可贵的史诗品格。一方面,作品真实记载了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推进过程,从“曙光”号飞船研制的艰难起步,到神舟一号无人飞船的成功发射,直至神舟五号载人飞船的顺利飞天并成功返回,它的每一步推进都记载和展现得十分清晰。另一方面,在这种纵向推进式的展现中,同时又

在各个横断面上展开了对这一系统工程的全景式叙写;从党和国家的高层决策,到众多工程部门和生产单位的团结协作;从各级工程指挥员的殚精竭虑,到众多科技精英的呕心沥血;从火箭和飞船的创新研制,到首批航天员的精心培养和艰苦训练,等等,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波澜壮阔的图景。不仅如此,作品中还不时穿插叙写世界载人航天史上的重大事件,这既是一种历史背景,同时也是某种现实参照。将中国载人航天的历史进程与世界载人航天史交相映衬,更增强了作品的历史感和宏阔视野,也更能启人思考。

作为报告文学,虽然在表现内容上主要是叙写真实的生活事件,但作为文学作品,它仍然要求具有较强的文学性。一是在史诗般的宏大叙事结构之中,融入了许多生动感人的情节和细节描写,披露了轰轰烈烈的大事件背后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幕,穿插了众多工程参与者和当事人的访谈,叙述了他们的亲身经历,表达了他们的真实感受。作品既有真切

实现载人航天梦想的中国人什么样的启示?还有,美国人一再声称:“谁能控制空间,谁就能控制地球”;克里姆林宫也多次宣称:“控制空间,是赢得战争的先决条件。”他们何以如此咄咄逼人?我们发展航天事业当然是为了人类的和平与进步,中国人虽然无意于控制地球和人类,但为了不被霸权主义者所控制,是否应拥有与其相当的反控制的实力呢?如此等等。作为事件报告文学作品,它的主要功能是在叙写事件,然而它如何在对事件的具体叙写中,引导读者深入到事件的背后,自然而然地引发对深层次问题的思考,是使作品获得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强大思想力量的有效手段。在这方面,这部报告文学作品同样可以给我们许多有益的启示。